

超越与回归：叶芝时代的爱尔兰伦理话语精神气质

张元 赵惠娟

(河北金融学院爱尔兰研究中心 河北 保定 071000)

(河北金融学院国际商务外语学院 河北 保定 071000)

【摘要】爱尔兰时代精神的缔造者叶芝及其所处的“爱尔兰文艺复兴”的特殊时代,进行自我及其精神发展的问题探索。以黑格尔《精神现象学》和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为理论资源,认为叶芝与爱尔兰时代精神的统一,也是叶芝自我精神对爱尔兰时代精神的一种外延。

【关键词】伦理;爱尔兰;“成为人”并“在一起”

1 伦理话语与精神气质的时代同一性

“‘伦理’是一种理念,具有深刻的文明史意义。^[1]”伦理所演绎出的文明形态与精神气质对于社会的发展与进步具有十分重要的影响。“伦理话语精神气质”,是“演绎了家国一体、由家及国的伦理话语的文化表达。^[2]”西方文化中,“伦理”作为一种特殊的契约方式,以一种需要的价值体系融入利益思考。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论述到:“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3]”在每个时代的经济基础与其相对的伦理观和文化观等等,作为能够影响到“绝对精神”的时代发展的人的各个方面,任何的变化,都会对时代产生巨大的影响。“因为精神是人类特有的现象,每个人既是外部精神(客观精神)的接受主体,同时还是精神现象的发生主体(主观精神),两者交汇才作用到个人的全部精神生活。^[4]”反之,在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中,自然与欲望(自我与个人意识)、认知与意志(自我与社会群体道德意识)、自我意识与自我超越(人文意识与人类精神)为我们提供了一幅从自我到绝对精神的发展图示。从黑格尔的辩证循环的主观精神与客观精神发展,主客观精神统一的对象化活动,构成了精神发展的基本规律。

从理论领域说来,植物,动物,石头,空气,光等等,一方面作为自然科学的对象,一方面作为艺术的对象,都是人的意识的一部分,是人的精神的无机界,是人必须先进行加工以便享用和消化的精神食粮:同样,从实践领域说来,这些东西也是人的生活 and 人的活动的一部分……在实践上,人的普遍性正表现在把整个自然界——首先作为人的直接的生活资料,其次作为人的生命活动的材料,对象和工具——变成人的无机的身体。^[5]在马克思语义逻辑中,动物的存在作为自然界的组成部分,单一的从属于自然界;动物对于自然界的生理反应、被动的应付环境的刺激行为,是一种本能活动,而非人作为自由的生命活动,人的生命活动是人的自由与自觉的特性是自我的本质。

根据伦理的文化体系,人类从类生命的个体超越自我个体意识,由个体意识到集体意识的变化,乃至形成绝对精神回归至人类个人的类的生命历程的螺旋上升过程,“源于彼岸终极实体的宗教思考和‘道’的道德思考相区分,“ethic”相分殊。^[6]”在黑格尔语义中,自身在他物的对象化中,经历与回归与自我的圆满。

2 叶芝的创作过程的伦理话语与爱尔兰时代精神气质的同一

叶芝的创作分为早、中、晚三个阶段。回顾爱尔兰历史,由于英国与爱尔兰的特殊关系,特别是“爱尔兰大饥荒”之后爱尔兰的大变化,爱尔兰独立运动的开始使得,爱尔兰人对爱尔兰文化的不同建构,主要分为:抗英独立、暴力独立、融合独立的三个阶段。

在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中,对于意识的开端有“意识”——从“这一个”到“共相”、“自我意识”——从“欲望”到“苦恼的意识”、“理性精神”——从观察伦理到道德实践的独特介绍。按照黑格尔的三分法,事实上1600年以来的爱尔兰民族运动,也是符合以上逻辑。

2.1 从“这一个”到“共相”,爱尔兰意识的诞生

第一阶段是从1865-1900年,是叶芝创作的早期。叶芝受到英国贵族教育与爱尔兰什么主义影响,其间作品多为浪漫主义色彩,如《当你老了》等。此时的西方文明处于一个混乱的状态,新旧交替,秩序消解。这一时期,叶芝主要追求浪漫主义,长期的英国定居生活与青少年时期由于爱尔兰民族身份所受到英国的欺辱,让叶芝产生脱胎于殖民地的民族情绪,这时可以说叶芝有了一种“反抗精神”的萌芽。叶芝的诗歌《因尼斯弗里湖岛》、《在七片森林里》极力赞颂爱尔兰美丽的田园牧歌景象。通过赞美农耕传统,叶芝将爱尔兰的美丽画卷借以艺术的方式表现出来,以文笔勾画出爱尔兰民族的基本面貌。通过对于美丽事物的勾画,叶芝对象化的对于英国为代表的工业文明进行隐喻的批判。

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中曾经提到:“伦理王国在它的持续存在里始终是一个无瑕疵、无分裂而完美的统一世界。^[7]”对于爱尔兰文化是否存在,在“这一个”被称之为爱尔兰的国度事实上并没有概括出来。叶芝初期的爱尔兰,由于对象化认识的缺失。对于爱尔兰本身的意识,只是前提性的存在,并没有进入自我。因此,爱尔兰作为独立民族的民族意识依旧被英国的国家意识所笼罩。爱尔兰人所感受的一种歧视和认知,只是一种矛盾的共相,甚至于可以理解为不知无知。

2.2 从欲望到苦恼——爱尔兰自我意识的初次实践

武力抗争是爱尔兰民族运动的一个新的变化,由于英爱双方的不对等特殊关系与爱尔兰民族自我意识的觉醒,区别于英国的爱尔兰是当时爱尔兰有识之士的第一认知。正如,中国依据古词语“矫枉过正”,在对于何为爱尔兰?何为英国?对于两个民族文化交融的分离,甚至于语言习惯的彻底分离的想象实践,使得爱尔兰民族“自我意识开始经历从“欲望到苦恼”的变化。

该阶段,也是叶芝创作的重要节点。除了野蛮的武装反抗,以叶芝为代表的爱尔兰人也尝试过议会斗争,爱尔兰也因此掀起了轰轰烈烈的自治运动。这些政治因素深深地影响到了叶芝。叶芝的创作风格开始从田园、浪漫的风格转向现实、冷峻的写实风格。

因英国和爱尔兰的民族矛盾激化,爱尔兰在新芬党领导下开展了民族自治运动,激进民族主义者认为爱尔兰要实现独立,必须以暴力手段推翻英国的殖民统治。叶芝认为激进的民族主义者和英国殖民者都造成了爱尔兰现在的暴力和动

荡不安，以叶芝为首的文化民族主义者担心，激进民族主义者将摧毁在爱尔兰文艺复兴中建立的“农业爱尔兰”。1916年复活节抗英起义震惊了对政治和现实失望的叶芝，叶芝对爱尔兰未来陷入沉思。这一阶段，四首以英爱战争和爱尔兰内战为题材的诗歌即《1913年9月》，《1916年复活节起义》，《1919年》，《内战中的沉思》，以《一九一六年的复活节》为例，其中的壮烈而优美的字句，显示出叶芝对激进民族主义者暴力行为的矛盾心态，表现出叶芝对爱尔兰民族自治运动的复杂情感。爱尔兰文艺复兴的领袖们，在对于国家的独立从欲望的实现，与现实经历的苦恼中得到了并想象的爱尔兰现状使得大家都很苦楚。叶芝本人由于英国的经历，甚至于被大家看作反动的异己的力量。流血之后的爱尔兰，经历了实践的客观现实，对于何为爱尔兰展开了自我意识的实践思考。

2.3 从观察伦理到道德实践爱尔兰理性精神的形成

在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中，自我意识在自我追逐自由与对于客观现实的否定中，无法实现自由与自我实现的目的，从而自我意识进入理性阶段，对于客观存在的他物，作为自我意识的一部分，以肯定地态度，进行自我即实在的认知。使得自我将历史融入自我不同阶段之中，而非孤立情境。尽管英国对于爱尔兰在相当一定时间，进行了殖民统治。但是，全盘否定英国对于爱尔兰发展的作用与民族文化的影响，对于爱尔兰显然是不恰当的。因为，爱尔兰文化与英国文化事实上已经在某一时期同为一物。历史不是部分，而是全体。正如一句谚语：“我们无法在倒洗澡水时将孩子也一起扔掉。”叶芝对于爱尔兰文艺复兴，最大的意义就在于将爱尔兰文化融入世界文化之中，在保留爱尔兰文化的生命力的前提下，使得爱尔兰文化再次辉煌。

经历了复活节运动，在一系列的武装反抗与爱尔兰民族内部对于爱尔兰文化的思考，无论是爱尔兰文艺复兴的各个群里还是爱尔兰民族的群体大众，在经历了一系列爱尔兰独立实践之后，对于爱尔兰的未来进行了思考。在叶芝看来，爱尔兰文化的存在与什么是爱尔兰文化之间的矛盾，是爱尔兰文艺复兴的主要矛盾。单一的追求什么是爱尔兰文化，相比起延续发展爱尔兰文化来说，爱尔兰文化的存在更重要。

爱尔兰民族的第三次精神气质的同一变化，就在于该民族抓住了民族发展矛盾的同一性，使得矛盾得以以场所进行而非瓦解。第三阶段是从1919年到1939年，叶芝创作的晚期。1992年，爱尔兰自由邦成立，爱尔兰在一定意义上宣布了独立，颠沛流离斗争不休的革命时代成为过去时，压力和杀戮成为历史，政局也逐渐平和，在外部环境相对缓和的情况下，这一时期，叶芝受到现代诗歌具有鲜明、确切意象的影响，他的创作更加具有坚强、有力、凝练的现代主义风格。

随着激进民族主义在爱尔兰的不断壮大与时局的持续动荡，叶芝以艺术为战场，开辟了自我的爱尔兰民族自救之路。叶芝从人民生活的角度发掘创作灵感与素材，并在世俗与现状中达成和解，叶芝的创作也升华到了一个由物质追求到精神探索的高度。

叶芝希望通过文艺创造出一个民族的灵魂，进而造就一个新的爱尔兰民族。叶芝认为要使整个爱尔兰民族团结起来，实现爱尔兰民族独立，必须在爱尔兰建立一种高雅的民族文化，必须培养一群具有高度文化修养的爱尔兰民众，而能够胜任这项工作的即是以叶芝为代表的艺术家。

这一时期叶芝的创作日臻成熟，作品具有现实主义、象

征主义、哲理诗三种因素，诗篇直接歌颂人生，表现情欲，艺术上具有歌谣体的特色，由此唤醒了叶芝作品对人文意识的回归，从大众化的生活和语言中汲取灵感，使创作更具有时代精神。

3 超越与回归：叶芝时代的爱尔兰伦理话语精神气质

时代精神是一个民族在不同历史阶段所表现出来具有其时代特征的精神，是国之根本，而非普通的大众意识或社会意识。在世界文明话语中，国家是文明多样性、文化多样性的体现。“精神”虽然源自复杂甚至相互矛盾的大众意识或社会意识，是这些意识的升华为时代精神具有一个漫长的过程。精神是一个民族赖以长久生存的灵魂，唯有精神上达到一定的高度，这个民族才能在历史的洪流中屹立不倒、奋勇向前。”成为人，并在一起，不仅是伦理话语的精神气质，更是一个民族与国家长期以来的时代精神的高度凝练。时代精神作为超脱于一般意识形态的精神实质，代表着时代的发展潮流。国家与民族的伦理话语及其所产生的文明与文化形态作为“市民社会”话语表达，缔造出迥然不同的伦理话语与精神气质。

伦理话语与道德传统作为意识形态的特殊部分，是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同一性”体现，其具有内在特殊的精神气质。叶芝时代的爱尔兰文艺复兴以“爱”为主题，超越爱尔兰传统文化的限制，创造性地将凯尔特文化融入世界文化之中，使得爱尔兰文化得以延续发展。

爱尔兰19世纪时代精神乃至叶芝本人，都早已成为历史的银河中璀璨的星光。从意识——精神——时代精神的发展来看，个人意识必然要经历一个长远的历程，才会与时代精神相融合，并在时代的发展中得以统一与回归。

经历了文艺复兴的爱尔兰，从实践中获得对于未来社会的道德意识。随着爱尔兰社会的发展和进步，爱尔兰民族精神从自我的异化中得以显现，在不依赖于他物的前提下，将爱尔兰的民族性与大众性在符合自我道义的前提下，统一起来。在这个由他物规定到自我规定的民族性变化中。爱尔兰民族以一种自觉地、属人的活动中，再次向前。

参考文献：

- [1] 樊浩：《“伦理”话语的文明史意义》，东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南京，2021年第20211期第5-16页。
- [2] 樊浩：《“伦理”话语的精神气质》，学术界；合肥2021年第20211期第5-19页。
- [3] 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54页至第61页。
- [4] 季小江：《超越精神——论企业家自我的发展》，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第2页，2010年1月。
- [5] 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2018年5月。
- [6] 樊浩：《“伦理”话语的精神气质》，学术界；合肥2021年第20211期第5-19页。
- [7] 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下卷，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19页。

作者简介：

1. 张元（1992—），男，汉，安徽阜阳人，管理学哲学博士，河北金融学院爱尔兰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战略哲学、艺术精神与国别区域相关问题。

2. 赵惠娟（1971—），女，汉，河北文安人，河北金融学院国际商务外语学院教授，主要研究方向：国别区域研究。